

何平 合和统
 发挥 业建
 司的 路企
 & 在 个
 该农 公于
 仓库 土规
 售作 是公直
 立村 在农进
 是 -&\$- 34 北
 的 式 并调
 地 社 务主
 桃庄 公 的
 是通 年 主
 村社 会 同 体

一、 本

企业 务
 式 和 企 业
 根 据 职 能
 益 性 服 务
 竞 标 ， 参
 区 展 示
 力 尤

投资
 桃庄农
 乡村书记
 桃庄农业公
 足农业，主
 种植结构。
 效益也因此
 经营运转
 本文将结合

的方式有多
 模式。这两
 镇和县级
 质量、服务
 论的企业
 提高社区居
 深，包括
 的服务时
 的关系。与

立体联动,综合发力,破解公共服务难题。^①而为了加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需要从完善政府与企业间数据共享机制,政企合作的定价机制与付费机制等角度入手,^②也存在政府向企业派驻人员或组织,推动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③村企关系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企业在村域范围内生产经营时与村庄之间的地位关系及互动实践。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村企关系的变化呈现多样性,随着村庄和企业家之间所拥有资源可替代程度的变化,村企关系由“村庄型公司”向“公司型村庄”转变。^④企业对村庄产生深刻影响,经常出现忽略农民的社会、文化需要和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庄福利发展。^⑤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村企双方行动逻辑存在根本差异。企业尤其是外来资本秉持权力逻辑和精英导向,而村庄在利益导向之外,还有建设好村庄的价值理性,企业的资本理性与村庄的互惠道义性需求难以互融时就产生困境。^⑥一些企业为避免困境产生,直接选择成为村庄中的“飞地”^⑦,逃避在村企之间寻找市场逻辑和乡土逻辑之间的平衡。^⑧这种消极的村企关系严重影响了村企间的有效互动,很难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的治理效能。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在关注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时,侧重于对政商、村企关系样态的关注,特别关注了企业本身的实践行动,但对具体的参与机制关注有限,忽视了企业与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企业作为村庄的外来主体在参与村庄社会治理时,涉及到与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民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关系影响着企业参与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共同体形成后还需要有动力维持其长期发展,因此,动力机制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基于此,本文从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以增加农民就业、完善基础设施、处理村民纠纷等为主要形式,其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参与这些事务时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这种互动本质上是企业作为一个外来主体嵌入到村庄社会结构中,即存在嵌入机制。事实上,我们也不应忽视企业的社会属性,波兰尼认为市场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就是市场逐步嵌入社会的过程,任何的“市场经济”都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⑨因此,企业不仅有单一的经济属性,还有社会、道德等多维属性和多元化目标。祖可和迪马吉奥将嵌入性分为文化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和政治嵌入,^⑩结构嵌入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认知嵌入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文化嵌入、社会嵌入和政治嵌入来分析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嵌入机制。具体来看,为了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企业需要通过与农民的互动,了解村庄的文化习惯,并根据这些习俗惯例做出行动调整,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嵌入。企业为农村提供社会服务也需要与村集体进行互动,受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因此企业与村集体的互动会形成社会嵌入。除了农民和村集体,地方政府在村庄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也不可忽视。虽然地方政府在村庄之外,但乡镇等基层政府的治理对象和任务落在村庄内部,因此企业也需要与地方政府互动,获得支持和指导,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嵌入。综上,企业参与农

① 杨典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3-4年第3期。

② 李勇坚 《“化危为机”之经验研究 政企合作如何有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载《人民论坛》3-3-年第5期。

③ 何轩,马骏 《党建也是生产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载《社会学研究》3-&*年第\$期。

④ 郑风田,阮荣平,程郁 《村企关系的演变: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载《社会学研究》3-&3年第&期。

⑤ 杨轶华,祁晓民 《公共协商:企业参与农村社会福利供给的路径探索与共同富裕——基于吉林省白山市某案例的实证研究》,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3-33年第3期。

⑥ 蒋国河,江小玲 《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下乡与村企关系:互惠难题与合作困境》,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3-33年第&期。

⑦ 徐宗阳 《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载《社会学研究》3-&,年第#期。

⑧ 陈航英 《土客结合:资本下乡的用工机制研究》,载《社会》3-3&年第5期。

⑨ [英]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3--4年版,第33页。

⑩ hR^=9, K, X=6;AA@, 0, 0: Seructure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E+:=A8: !;E+:=18A Q9=>8:H-M 0:8HH, &' '- , 02#, e#*d

包括经济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当然，这些嵌入程度越高，企业参与村庄社会的关联程度更紧密。

都 岸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参与农村社会，并非单纯为了企业利益的获得，即在为农村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企业利益与农村发展、农民利益之间就存在交换机制。我们不妨从现实案例入手，分析企业参与农村社会发展的逻辑。事实上，当企业、政府和社区在互动过程中，企业通过提供“有效治理”和社区关注的“有效服务”实现利益交换。现实案例，交换机制表现为群众利益与企业利益支持的交换。

利

本形成过程中，企业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企业参与农村社会形成主要依靠企业与农民、村集体

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嵌入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利益来影响经济行为，也可以通过文化认同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目标。^②“文化嵌入”是指企业在参与农村社会发展中，企业需要具备乡土性，即乡土性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需要考虑的因素。

个招呼，随手递根烟闲聊会儿
不再是一个有心理距离的返乡

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公司将乡村干部、种植能手等整合进公司管理体系，降低交易成本，^①对村庄形成社会嵌入，获得支持性、互补性资源。企业与村集体的这种合作共治的关系有助于企业深度参与到村庄治理中，与村集体分工合作为村庄提供社会服务。

（三）政治嵌入：与地方政府形成协同共赢的关系

在祖可和迪马吉奥看来，政治嵌入是指行为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对主体行为产生影响，^②可见，政治嵌入强调的是政治因素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讲，地方政策、地方行政结构、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等都会对行动主体产生影响。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必然超出村庄范围，与地方政府等村外主体共同服务村庄。农业企业参与村庄社会治理，为村庄引入资金、技术等资源，会受到地方政治环境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因而农业企业需要关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K县是我国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是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其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33-万亩，当地的农业工作任务重，农业相关项目也较多。桃庄农业公司在当地属于经营面积最大的农业企业，它在机械化率、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上相对于其它农业经营主体更具有优势。因而，地方政府需要申报一些农业项目时，会首先找到桃庄农业公司动员其进行申请，农业公司也会积极配合递交材料。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农业企业都愿意申报这些项目。访谈中很多农业企业或者种粮大户都表示“申请那些项目太麻烦了，光那些材料都要打印一大摞，准备这些材料太耗费精力，我宁愿去地里多干点活。而且这些项目申请下来耗时也非常长，有些项目是说给钱，但通常很久才到位，我之前申请的都还没有见到钱呢”（ZXT%3-33-#&）。因此，当地方政府将项目申报通知发出后，往往是没人响应或者响应者寥寥。而对于桃庄农业公司的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人员则表示非常认可，“桃庄农业公司每次都很积极，我们通知有什么项目要申报了，说它条件符合，（工作人员）马上就会把资料整理好交过来，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确实很多人都不愿意申请，都是种地的，准备那些资料对他们来说都很难”（

夫有责”的价值观要求。因此，很多企业家经营成功后都会回馈乡梓，建设家乡，依靠这种情怀，一些企业在利益追求之外也寻求制度创新，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事实上，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经营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它与社会是共生的，其经营发展嵌入在社会关系属性中。^①企业的社会声望高低与其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密切相关。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为社会贡献力量越大，企业越能够获得正面的社会评价，企业发展也更长远。因此，很多企业都将维护群众利益，实现社会效益作为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追求。桃庄农业公司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也经常表现出维护群众利益的面向。

桃庄农业公司处理与农民间的关系奉行真诚和不计较的原则。“之前流转土地时，有个寡妇就是不肯把土地流转给我，她家周边的土地都流转了，她就是想让我多给点租金，但租金必须是统一的，不能单独给她家多一点，否则别家肯定不同意的。她态度也很强硬，最后就没把土地流转给我。后来还经常找麻烦，说打药的时候打到她家地里了，种地的时候多种到她家地里了。有一年收麦时下大雨，大家都在抢收，我的几台机器都下地收麦子，那个时候她喊不来车，其他人的车都在忙着收大片地呢，就她这一片没人愿意折腾费劲的。我看她一个人在地里收，挺可怜的，总不能眼看着她一年的心血全毁了吧，我也就没跟她计较什么，顺便帮她收了，也没跟她要收割费”（[T? %3-33-#&*）。

农业公司维护村民的利益，村民也处处为公司利益着想，笔者在调研中访谈到一位长期在桃庄农业公司做零活的老人，她偶尔也在其他种粮大户的地里干活，但“只要桃庄公司打电话说地里有点活需要干时，即便那会儿我们在忙其它事情，我们也会立刻过去，哪怕不要工钱，也会过去”。“之前打药是按桶算钱，有一次药打完了，领头的让我们继续打，可是已经没药了，他说管它有没有药，哪怕打水也行，反正只要打就有钱。但这个事情我是坚决不干的，人家桃庄公司平常对我们都很实在，我们在地里干活时候经常给我们买点饮料什么的，那我们干活肯定得凭良心”（?U' %3-33-#35）。

维护村民的利益，为桃庄农业公司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很高的企业声望，而信任和认可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和基础。^②在调研中发现不管有没有把土地流转给桃庄农业公司，桃庄农民普遍认可农业

成熟时期,几个长工都会到地里巡逻。除此之外,在发现盗窃事件时,公司会报警处理,同时也会告知村民共同监督,举报偷盗农作物的人,公司直接奖励3---元。白总对流转土地的认识:“既然我已经把土地流转过来了,那么,土地上的东西,包括秸秆就都是我的,只有我同意你去捡拾,那才可以,否则就是偷盗”([T? %3-33-#3\$)。经过长期互动,村庄规范和农民观念已经有所转变,偷盗行为大大减少,村庄社会风气也得到明显改善。

其次,逐渐形成村庄土地流转秩序。在桃庄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经营前,当地的土地抛荒问题比较严重,白总被请回来种地也与当时土地抛荒问题有关。当时部分农民外出打工,要么选择直接撂荒,要么把土地给亲戚种植,这一过程中几乎不存在土地租金的问题。桃庄农业公司成立后,要进行土地规模种植经营,土地价值就以土地租金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在桃庄农业公司经营土地前,部分土地也存在租金,但租金更多考虑了人情,甚至会因为碍于人情而不收租金,积攒的不公平感会在其他事件上形成纠纷。而桃庄农业公司进入后,由于流转面积大,涉及范围广,在其影响下,当地的土地租金逐渐市场化、合理化,最终稳定在供需平衡的价格上,农民很少再因租金问题而产生很大的争端。

桃庄农业公司对村庄秩序的影响,加深了企业的嵌入程度。近些年来,桃庄农业公司开始由原来的亏损转为赢利,这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即村庄秩序密切相关。桃庄农业公司参与村庄社会治理,改善了村庄社会秩序,也弥补了村庄缺乏治理精英的困境,^①这反作用于桃庄农业公司,为其提供了有利的经营条件。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存在村庄秩序与营商环境的交换,这一交换机制也为企业参与村庄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效动力。

(三) 服务效能与行政支持的交换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目标是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村庄发展水平,这是企业在村庄社会中服务效能的体现。桃庄农业公司参与乡村治理后村庄治理水平显著提高。首先,一些老人和留守在家的中年人获得了就业机会。桃庄农业公司有&3名长期工作人员,平常也会雇佣一些临时工做边角料的工作,而在收割、施肥等农忙季节则会雇佣更多临时工。这种农业工作对于老年人等家庭剩余劳动力来说是体现他们价值的机会。其次,桃庄农业公司积极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做好相关绿化美化工作,促使村庄整体环境显著提升。再次,桃庄农业公司还积极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其仓库大院被作为公共空间,满足农民晾晒、聊天和跳广场舞等多样化的需求。公司的农机也会被其他种粮大户借用,农机手也会经常帮农民修理机器。因此,桃庄农业公司参与村庄治理的效果明显,其服务效能得到充分发挥。

事实上,对于企业来说,提高村庄服务效能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行政支持,因为乡村振兴也是地方政府的治理任务。地方政府的行政支持主要体现在信息和资源的提供上。信息和资源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桃庄农业公司在积极参与村庄治理,提高服务范围和服务质量的同时,赢得了地方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使得地方政府在收到项目、农业发展方向等信息和资源时会优先考虑桃庄农业公司,相信其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和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并带动村庄发展。在此基础上,农业企业就可以获得政府支持。以信息沟通、视察参观和荣誉表彰等形式为代表的政府支持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象征性符号,可以作为企业的象征资源表明政府为农业企业支持,这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企业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

四、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治理中如果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因受科层制的影响,村庄治理将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如果单纯依靠村庄自治力量,由于缺乏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村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将受到限制。因此,需要将社会力量引入村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但对于企业这一主体参与村庄治理,则存在很多质疑,或者质疑企业是否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或者质疑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初衷。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很多企业可以平衡其价值追求和利益追求的可能,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为地方治理贡献力量。因

^① 肖平,周明星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基础、困境与路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年第5期。

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研究企业参与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机制，最大化地激发企业力量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结合经验案例认为企业参与村庄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形成机制和动力机制，这两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企业作为外来主体，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这是伴随着企业运营而进行的，因此，企业需要考虑村庄文化、社会结构和地方政治环境，在与农民、村集体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中，实现文化嵌入、社会嵌入和政治嵌入，嵌入机制是企业获得社会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过程，这为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条件。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理性时考虑到价值理性，但任何组织或团体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收益来支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费用，才能保证企业持续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即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还需要有动力机制。因此企业通过维护群众利益、调整村庄秩序和提升服务效能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有利的营商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是一种交换机制，背后是企业价值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平衡，这成为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动力机制，为共同体协作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因此，我们在强调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时不能笼统地呼吁多元主体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组织和多元主体的特点和性质，研究其参与治理共同体建设更具可行性和现实性的途径。首先，需要加快制度建设和结构改革，为企业参与村庄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其次，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都要以村庄为主体。因此，农业企业需要尊重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激发村庄内生动力，在激发村民自治能力的基础上，发挥农业企业的治理功能。最后，需要协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形成协作共治的治理格局，借助多元治理主体的多样化稀缺要素，